

# 谈毛主席诗词的风格

季元龙

毛主席诗词中有着姿态万千的艺术形象，也有着既一以贯之又丰富多采的思想艺术风格。这种思想艺术风格，展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战斗的风貌。研究、认识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风格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很有必要的。

对毛主席诗词的思想艺术风格，周总理作了十分精当的概括：“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种雄伟的气魄，盎然的诗意，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演示的“威武雄壮的活剧”的艺术缩影。毛主席作为这一伟大史剧的导演，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的伟力，正是深深植根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可以说，是阶级给了领袖以力量，领袖又艺术地反映了这个有力量的阶级。这也许是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风格上第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

《沁园春·长沙》是一幅绝妙无比的湘江霜天秋色图。使这幅色彩鲜丽的形象画面活起来了的，正是洋溢在词章中的中国无产阶级早年时期“风华正茂”的蓬勃朝气，和浸透在画幅中的对“苍茫大地”暂落敌手的怅恨之情（词中的“怅”字，诸家均作怅惘、惆怅讲；今据《史记·陈涉世家》，作“怅恨”讲）以及无产阶级一定要“主沉浮”的雄伟气魄。作为毛主席早期创作的动人诗章，《沁园春·长沙》为毛主席整个诗词的思想艺术风格，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探寻到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沁园春·长沙》上阕，诗人以一“看”字总领七句，触眼前之景，生心底之情：“江山如此多娇”，却又未曾归于人民之手。怅恨之情油然而生，激问之感发于笔端：谁主沉浮？抚今思昔，在下阕里，一个“忆”字总领九句。透过对峥嵘岁月的回顾，对“万户侯”的“粪土”，回答了上阕的问题。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具有何等深沉的眼光，何等广博的胸怀，何等高尚的精操！面对现实，诗人有着深深的忆念：“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个发问，既能勾起同学少年对往昔的追忆，更深化了“谁主沉浮”的未来去向。确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诗人在自励，也在励人。诗人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一首《沁园春·长沙》，不正形象地暗示了中国革命航船的未来去向和它必经的坎坷么？

是的，《沁园春·长沙》所显示的思想意蕴是丰富而又深刻的。它由此而展示出来的雄伟壮丽的思想艺术风格，也正是建立在诗人对现实认识的最深刻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一九二五年那个“万山红遍”的时代的本质之上的。因此，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可见

的、具体的形象去感觉它，认识它。而且，也正是生活本身的发展，给了诗人思想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诗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和整个阶级一起欢乐，一同痛苦，并把这一切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形成了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风格的独特风貌。

一九二七年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血腥大屠杀即将到来。此时此际，大地上透出了血雨腥风的气息。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尚未认识自己的领袖——这种认识，往往要付出多少失败或成功的代价——我们的领袖却预感到了党和革命可能到来的危机，而又无法使全体同志理解。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心情怆凉。这种怆凉的情怀，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低暗阴沉的景物（“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怆凉郁闷的心情（“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既是诗人个人情愫的记录，又是我党艰辛前行的形象写照，更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有力斥责和控诉。毛主席诗词中这种怆凉的情怀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显示出了一种悲壮的风格，这可以说是第二个特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似乎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研究。

别林斯基曾经正确地指出：“一个民族的诗歌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反映出它的生活，连同全部富有特征的细微差别和类的特征，既然诗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所以一个民族的诗歌也就是民族的意识。”（《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五五页）而毛主席诗词中悲壮的风格，可以说，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一种形象反映。这种风格的形成和产生，正是领袖深刻了解人民，了解民族的表现。同样一首《国际歌》，由中国无产阶级唱来，就较别国同志为悲怆（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七七年九期），正是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的生动反映。

诚然，豪放、开阔是毛主席诗词的基调、主流。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情调、色彩，在毛主席诗词中焕发着奇光异彩。毛主席本人对古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的称道、赞赏，也说明了这种风格、流派、创作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但是，毛主席诗词的情感形象思维，远比单纯的豪放、开阔要丰富深沉得多。正是这种丰富深沉的情感画图，为豪放开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毛主席诗词有了崇高的诗的意境。同样不应忽略的是，毛主席也欣赏杜甫，称杜甫的诗为政治诗。杜甫《北征》等名篇中沉郁顿挫的情感画幅、艺术风格，在毛主席诗词中依稀可寻，是有所继承和创新的。

学习毛主席诗词，我们可以发现，领袖的感情世界博大精深，丰富强烈。喜怒哀乐，尽皆有之。每当革命处于重大转折或进入低潮时，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毛主席诗词中，总有一种沉郁顿挫的情怀。或苍凉，或郁闷，或沉郁，透露出一种悲壮的情调，形成了凝重的情感画图。领袖深深置身于革命之中，革命的曲折，斗争的波澜，都在他的艺术珍品中形象地体现了出来。这种悲壮的情感，正是领袖与人民、与革命血肉相连的生动表现。

在《菩萨蛮·黄鹤楼》、《忆秦娥·娄山关》等毛主席诗词中，我们更多地不是体察到豪放、飘逸的情调。相反，怆凉、郁闷、沉郁的感情却十分浓烈。但在这种怆凉、郁闷、沉郁的感情中，我们感觉不到一点一滴“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孤

独，更没有“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的颓丧。凝聚在毛主席诗词中的，是无产阶级即使处在艰难困境中也饱满之至的“心潮逐浪高”的高昂和“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强。“国际悲歌歌一曲”，一个“悲”字，格外精当，把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融为一体，显示了毛主席诗词中思想艺术风格悲而且壮的一面。正是毛主席诗词中这种悲壮的风格，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深厚凝重的情感形象画图，具有了格外深沉强烈的撼动人心的力量。而毛主席诗词中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理想光辉，不仅有了坚实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基础，而且还以它特有的耀眼光彩照亮了凝重的情感形象画图。使人感到悲怆而不消沉，有着扎扎实实的感人力！

毛主席诗词中这种悲壮的风格，是一种客观的存在，需要进行认真的认识和研究。在毛主席诗词的研究、评论工作中，这可以说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如果说，我们的同志对此缺乏应有研究，还主要是认识上的局限的话；那末，“四人帮”一伙绝口不准人们提及这一点，则是包藏着祸心的。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及彻底清算，“困难多于顺利不知多少倍”。虑及革命前途，诗人郁闷，沉郁，痛苦。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革命也才找到正确的出路。诗人和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心情，也才“豁然开朗”。对这个问题，“四人帮”怎么会触及呢？他们对革命幸灾乐祸，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革命的情怀，包括革命处于危机——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时的郁闷，痛苦，自然不准人们谈及在领袖心灵中留下的那种苦闷、沉郁的情绪痕迹了。但是，正是在这种情绪痕迹中，包孕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毛主席诗词是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在这些艺术珍品中，强烈地表现着诗人的个性。这些艺术珍品，既属于整个阶级和民族，又确乎为诗人所“独专”。在毛主席诗词中，有着“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种强烈的创作个性，特别细致而突出地表现在毛主席那些以爱情、友谊为题材的诗作中，形成了又一种细腻、深切的思想艺术风格，颇有些诗意缠绵之美，展现了毛主席诗词又一个新的天地，显示了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风格的第三个突出鲜明的特色。

毛主席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贺新郎》，是一首与杨开慧同志离情别绪的爱情诗。词中“照横塘半天残月”，景物“凄清如许”，富有画意诗情。分别时，二人“苦情重诉”；杨开慧同志“热泪欲零还住”，是那樣的细腻缠绵，情意深挚。“知误会前番书语”，再知心的人，也可能有误会；但这是暂时的，“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是二人爱情的颂歌，又是二人离愁的咏叹。二人在“霜重东门路”上，“凄然相向”良久，愁苦的心情一时无法排遣：“人有病，天知否？”诗人发出了自己的“天问”。于柔情婉转中开拓着开阔的意境，暗示了毛主席“挥手从兹去”的去向，词里的“人有病，天知否？”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后者豪迈遒劲，前者婉转情深。虽然同样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量，但在思想艺术风格上却又是同中有异的。

《贺新郎》下阕，继写送别情景，“愁丝恨缕”，徘徊之至。但这一切，终归要

“割断”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残宇”，革命的风暴，革命的斗争，诗人要“凭”它来“割断愁丝恨缕”。毛主席与杨开慧同志的爱情生活，在诗人笔下，以美好的想象把凄苦的现实推到了一个更新的境界：有朝一日，比翼双飞，在云中高翔，迎接未来，歌唱胜利。

诗人在二十年代渴想的胜利日子到来了。但是杨开慧同志却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杨开慧同志的牺牲，仍然深切地牵动着领袖的情思。毛主席三易其题的名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将革命胜利以答可敬先烈的中心主题，包孕在奇情壮采的神话幻想里。透过杨柳忠魂，轻飏九天，吴刚献酒，嫦娥献舞的形象画图，我们不难领会到毛主席对“知己”的热情赞美和含蓄思念之情，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

毛主席对杨开慧同志的思念之情，愈久而弥深。有时，诗人幻想“知己”轻飏九霄；有时，诗人又幻想“知己”“乘风下翠微”，来到了人间。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中的“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二句起势翩然，容易使人想起“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屈原《九歌·湘夫人》）这种清秋景色所构成的美妙而略带轻愁的意境，把湘君久候夫人未到的怅惘之情与《七律·答友人》中对杨开慧同志的思念联系起来。“斑竹一枝千滴泪”，在一景物细节中寄寓着绵绵深情；“红霞万朵百重衣”，则直抒了毛主席对当年“霞姑”的想念情深。末四句，由对过去“知己”的思念转入对湖南现实的赞美。“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一反“飒飒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凄清萧索景象，激发着诗人内心深处“孕育得很成熟”的深情：“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兴奋、激荡的情思，缠绵、深久的思念，壮丽、开阔的意境，有着无穷的寄寓，让“友人”们体察出了多少绵绵的深情！毛主席对杨开慧同志的这种缠绵悱恻之情，使一切以爱情为题材的古典诗歌为之减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固然有着爱情的热烈渴望，但感情世界未免偏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的另一首《无题》），固然有着爱情的坚贞执着，但意境似不够开阔。惟有“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遐想，才把多少热烈的渴望、执着的思念凝聚在开阔、壮美的诗的意境中，缠绵而不凄苦，情深而不偏窄，显示了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风格上的创新与开拓。

毛主席对他自己与杨开慧同志的爱情生活一唱三叹，余韵无穷，展示了诗人丰富深沉的内心感情，呈现出一种缠绵婉约的思想艺术风格。婉约中，又时有奇峰突起之句，石破天惊之笔，浑然成篇，自然合理，确实反映了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风格上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同样，在一些赠答友朋、互致唱和的诗章里，我们体察到了毛主席对同志和朋友的动人深情，即令是在一些进行“诗教”的诗章里，我们感受到的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诲。这些诗章，娓娓而谈，诱导谆谆，有极大的亲切感，使人如坐春风，受益匪浅。这些诗章，让朋友和同志从思想感情深处领会到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这一扑实的真理，从而得到巨大的教育和鼓舞。